

从《超越主谓结构》说起

——沈家煊先生访谈录

陶陶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重庆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诚邀沈家煊教授参加本次访谈。访谈围绕沈先生2019年最新力作《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一书中十个核心议题,以及蕴含其间的科学研判精神“以简驭繁和分清主次”展开。此外,为方便读者理解,我们在沈先生对答部分加上可参阅文献。

关键词:科学研判;主谓结构;名动包含;以简驭繁;分清主次;访谈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3-0093-07

被访谈者:沈家煊,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和所长,现为《中国语文》和《当代语言学》主编、《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名誉编委、法国《东亚语言学报》(*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编委,以及《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编委,现担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和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语言理论和英汉比较语法研究。

1 汉语语法研究三层观

陶陶(以下简称陶):沈家煊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本次访谈!您是做汉语语法研究的权威专家,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对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解?

沈家煊(以下简称沈):我觉得在中国做语法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汉语的问题,证明汉语也适用西方的那些理论和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发现西方的那些理论和方法对汉语不适用的地方,至少不完全适用。至于拿汉语的事实来迁就已有的理论和方法,那是不入流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从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比较中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来丰富和发展一般的语法理论,让国外的同行感到我们也在朝破解人类语言本质这个共同目标努力。

2 如何实现汉语界和外语界的深度融合

陶:在当下“建我话语体系、学术外译传播”的大背景下,能否请您针对广大青年学者和青年教师,谈一谈如何实现汉语界和外语界的深度融合和优势互补?

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其中一个研究室以前叫国外语言学,现在更名为当代语

收稿日期:2022-2-1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研究生市级教研项目“体认语用学理论与实践探索”(CYB21225)、四川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体认语言学本土化研究”(SISUZD2021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陶陶,男,重庆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用学研究。

引用格式:陶陶.从《超越主谓结构》说起——沈家煊先生访谈录[J].外国语文,2023(3):93-99.

言学,曾担任主任一职。该室的主要任务就是介绍引进国外的理论,供国内做汉语研究的学者参考。语言研究所的主体研究对象是汉语。中国的语言学家先要将自己母语的历史和现状研究通、研究透,而我在本科时学的英文,当年到了语言研究所当研究生,就得补中文系的课。

通过多年的学习研究,我们要学会能够用外语和中文两条腿走路。外语界的老师对国外的学术比较了解,思想比较开放。我自己最近十多年做的汉语研究,在汉语界有人接受不了,但在外语界却很受欢迎。原因是,汉语界受先入为主的观念支配,要摆脱印欧语的束缚很困难。法国著名汉学家保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曾说,汉语和汉字有一些东西,它冒犯了我们从希腊、拉丁语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那里继承下来的信念。西方部分学者放弃原则,转弯抹角地将西方的范畴强加到汉语研究上。中国的专家因为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影响,要摆脱这些束缚好像比西方人还要困难,这个话值得汉语界的人深思和反思。而外语界的情形是,你们没有沉浸到汉语的语法研究中去,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优势就是不受原有的研究范式的束缚,只要补充不足,就可以大有一番作为。

3 学术传承和经典阅读

陶:您在著作中反复强调“如果没有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等前辈学者的反思和洞见,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有价值的认识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学术传承的?

沈:汉语界和外语界搞语法研究都应该读三本经典著作。其一,赵元任1968年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尤其要读开头两章关于句子的论述。我一直认为,在语言学界,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没有谁可以超过赵元任。其二,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也收录在《吕叔湘全集》中。当时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汉语,该书对所遇到的问题有很好的总结。其三,朱德熙的《语法答问》(1985),朱先生在他那个时代,讲述如何摆脱印欧语观念的束缚,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如何坚持严谨和简单两条原则,来构建当时他认为较好的汉语语法体系。我们现在不是要一一接受朱先生的结论,而是应该学习他从事科研的精神和方法。我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学习,从名动包含关系做到现在的超越主谓结构,都是受益于几位前辈学者的反思和洞见。王寅老师和我共同的观点是:“人生精力有限,要阅读经典。”

4 递袭式 VS 递归式

陶:我们非常认同您关于阅读经典的观点,您认为汉语是递系式语言,是否也受益于前辈学者的影响呢?

沈:是这样的。除上述之外,我还推荐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等著作。王力先生首先提出汉语递系式,后来又称兼语式。如:“我劝你回去”,“你”既是“劝”的宾语又是“回去”的主语,“你”是一个递系项。但是后来的研究却倒退了,受印欧语观念的影响,把递系项仅仅局限于名词。王力的递系项是不限于名词的,动词也可以。譬如:“枪声响不停”中的“响”字,其结构其实是“枪声响+响不停”,因此也是递系式。又如《红楼梦》中“我买一个绝色的丫头谢你”,王力认为可以把“买一个绝色的丫头”看作递系项,句子是递系的“我买一个绝色的丫头+买一个绝色的丫头谢你”。“响”和“买一个绝色的丫头”都是句法上的VP,所以说汉语的递系结构不局限于名词,动词、形容词都可以。赵元任认为,这样的递系结构是汉语造句的精神。注意,是这种递系法,而不是递归法,才是汉语造句的精神!我曾引用赵元任先生讲过的话:英语表逻辑概念的部分量词 some,翻译成汉语时,由于汉语中没有对应于 some 的形容词,就必须用递系式来表达。如英语“Some men tell the

truth”一句,汉语说“有人说真话”,“人”就是递系项,句子是递系的“有人+人说真话”。这表明,汉语是用递系的方式来表达基本的逻辑概念,因此汉语是以递系法为本。而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结构的基本特性是递归性,递归性依托的是主从结构,只有主从结构才能谈得上递归。比如“爸爸的书”是定中关系的主从结构,中心语“书”是主,“爸爸的”是定语,是从。通过递归法,可以生成“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书”这样的复杂句。然而汉语中每个语言单位的运用,在中国人心中都是等价的。《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一书是由《名词和动词》发展而来,按照“名动包含说”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跟名词一样是指称语,所以汉语的谓语和主语一样都具有指称的性质。关于汉语的谓语也是指称语,可参看我2013年发表的《谓语的指称性》一文。Bloomfield(1916)在 *Subject and Predicate* 一文中早就指出,不要受逻辑概念的支配来理解 Subject 和 Predicate。特别是没有形态的语言,俄语“农夫穷”中“穷”没有任何形态,那么“农夫”和“穷”就是等价的。正因为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有等价的一面,所以递系项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只要起到递系的作用即可。

5 汉语动词有没有名词化

陶:您在2019年刚刚出版的《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一书,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学者对汉语动词有没有名词化,有没有零形式名词化这些问题有争议。就此,可否谈谈您的观点?

沈:朱德熙先生明确指出汉语的动词没有名词化,英语有名词化,以 explode/explosion、criticize/criticism 为例。有人反驳说,汉语的动词“(爆)炸”“批(评)”变成名词“(爆)炸”“批(评)”,是零形式的名词化。然而朱先生强调,汉语中连零形式的名词化也没有。所谓名词化或零形式名词化完全是“人为的虚构”。因为汉语几乎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做主语和宾语,如果还坚持汉语动词有名词化的过程,这完全是多此一举,违背科学研究的“奥卡姆剃刀”原则。我们应该说汉语的动词本来就可以做主语和宾语,这就是科学精神。在当时,真正能够贯彻这种科学精神的,我认为朱德熙先生是代表。推荐阅读朱德熙1982年的《语法讲义》和1985年的《语法答问》,其中有非常明确的解释。

陶:关于“名动包含”和“大名词”的问题,我们还有较多疑问,可否也请您谈一谈?

沈:我在2016年全面论证汉语为“名动包含”格局,这是在汉语里进一步消解主谓结构。“名动包含说”的核心要义是指汉语名词动词的性质和两者之间的关系都不同于印欧语的名词动词。性质不同,主要是指印欧语的名词和动词是语法范畴,跟语用范畴指称语和述谓语不是一样东西,而汉语的名词和动词说是语法范畴,其实是语用范畴,或者说,名词和动词的语法意义就是指称语和述谓语,这跟赵元任说汉语主语的语法意义就是话题是一致的(沈家煊,2019:21)。关系不同是指印欧语的名词和动词是分立关系,名词是名词,动词就是动词;而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名词是“大名词”,它包含动词,动词是一种动态名词。因为汉语名词动词的性质是指称语述谓语,所以名动包含实质是“指述包含”,指称语包含述谓语(沈家煊,2019:21-22)。

“名动包含说”使我们对汉语“谓词的类型不受限制”这个事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谓语根本是指称性的,虽然它通常由指称动作的指称语(通常说的动词)充当,但是并不排斥指称事物的指称语(通常说的名词)(沈家煊,2019:24)。

从逻辑学上讲,名动分立,在集合论里就是二者有并集和交集的关系。但假如是包含关系,二者就是全集和子集的关系。这是数理逻辑的常识。

陶:“名动包含说”提出以后,学界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将“(大)名词”改叫“指称语”为好,以免误解。对于这种不同的声音和建议,您是怎么考虑的?

沈:我坚持“名”不改名,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改名对中国不公,也不利于语言之间的比较。语法专家如果以为汉语的动词不是名词,那是受到印欧语眼光的束缚,他的语法观念出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我改名,而是他改变观念。第二个理由是,“名动包含说”把动词理解为“名词向动词虚化”这个动态过程的产物,“大名词”因此不是一个关于汉语的特殊概念,而是一个关于语言和语言演化的普遍概念,世界语言中“名词为本、包含动词”的语言不在少数。

我本人非常尊重学界不同观点的争鸣,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的百花齐放。朱德熙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有两处明确批评零形式名词化,当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朱先生不动摇,因为有简单原则摆在那里。不能做多此一举的事情。评价一个语法体系优劣的标准,除了严谨就是简单,简单和严谨同等重要。我在《名词与动词》一书中强调简单原则的重要性。现在有人从朱德熙先生所持的立场倒退,又重提汉语动词做主宾语是零形式的名词化,这在我看来是丢弃了朱先生治学的精神。

6 为什么汉语的动词本来就可以做主语和宾语

陶:接着您刚才讲的,为什么汉语的动词本来就可以做主语和宾语呢?

沈:因为汉语的动词本身就是名词——指称动作的名词,所以做主宾语的时候无须名词化。刘勰的《释名》,“名”就包含各种动作和性状的名称。就连当今的生成语法学派的著名专家理查德·拉森(Richard Larsen)通过汉语和一些伊朗语言的比较,也论证汉语的名词是大名词,包括动词在内。遗憾的是,国内做生成语法的学者大多对Larsen的创见视而不见或不予重视,只是跟着潮流去做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操弄,如移位、删略等等。难道Larsen不觉得他的大名词观与生成语法的核心观点“名动分立”相抵触?其实对Larsen和其他有成就的专家来说,有一条更重要的简单原则摆在那儿,大名词说可以对汉语和伊朗等一些语言的事实作出更简单的解释。我经常讲,简单原则凌驾于不同学派之上。不管你是哪个学派的人,都要遵守简单原则,简单是我们评判理论体系优劣的重要标准。

7 主谓结构是否具有普遍性

陶:主谓结构在西方思想、文化和语言中的地位如何?主谓结构是否具有普遍性?

沈:主谓结构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石,是西方语言和语法的主干(沈家煊,2019:2-6)。在西方语言(指印欧系语言)里,最重要的两对语法范畴是“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前者是句子成分范畴,后者是词类范畴。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关于主谓关系的思辨史。就此而言,主语和谓语在结构上对立互补,不能化约为一,侧重哪一项(认为哪一项更实在、更重要)是形成西方哲学不同派别的逻辑端绪。西方哲学家总是从主谓关系出发去理解其他各种关系,如实体与偶性的关系、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西方哲学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也无不从这个逻辑基础开始,如培根的归纳逻辑之于经验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逻辑之于批判哲学、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之于辩证法体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于现象学,弗雷格和罗素的数理逻辑之于分析哲学,都是如此(徐长福,2017)。没有主谓结构就没有命题,没有命题就没有演绎推理。基于主谓结构的逻辑支配西方大部分学术和日常生活数千年。

正是因为主谓结构在西方语言和语法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西方的语法学家大多认为主谓结构是人类语言普遍具有的基本结构,只是在标记主语和谓语的语法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8 汉语是否有主谓结构

陶:那么汉语有没有主谓结构呢?

沈:汉语有没有主谓结构这个问题,在我2019年《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一书中所讲,如果说汉语也有主谓结构,这只是一种比附的说法。上篇的第六章对汉语的事实有简要的归纳:无主句是正常句子;主谓结构可以做谓语;谓语结构的地位跟其他类型的结构地位平等;动词可以自由做主语和宾语;谓语的类型不受限制,也可以由名词充当;主语的语法意义就是话题,谓语是对话题的评说;话题在汉语里是广义的,指信息传递的“起说”部分,后面的说明是“续说”;汉语的名词是“大名词”,包含动词(动态名词)，“名动包含”的实质是“指述包含”，指称语包含述谓语，谓语也是一种指称语;主语加谓语的整句由一问一答两个零句组成，一问一答应理解为广义的引发-应答;汉语特多流水句，流水句有断连性、指称性、并置性、链接性、韵致性;主语和谓语之间除了接续关系，还有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汉语里更广泛、更直接;汉语的词类首先区分摹状词和非摹状词，重叠是一种语法手段(沈家煊,2019:73-74)。以上这些特性互相关联，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在汉语里消解主语和谓语的的对立，消解动词的中心地位，一方面从正面说明汉语里地位类似主谓结构的东西大致是什么，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对话互动的角度看主谓结构，突破了静态的结构分析，认知到汉语的句子是“用句”；二是突破了 sentence 的狭隘范围，对汉语流水语篇的特性认识上有重要进展(沈家煊,2019:74)。

9 主谓对等关系对东西方的语言观产生的影响

陶:您基于西方哲学和逻辑学所论述的主谓等价关系,会对印欧语和汉语研究有怎么样的影响?

沈: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看,主谓结构为基干一直未变。亚里士多德的 S-P 模板,认为 S 重要,是属于本体论,而 Frege 认为 P 更重要,基于谓词演算,整个逻辑学的重心发生了反转,但是基干不变。到乔姆斯基,西方还是坚持动词中心论,也就是谓词中心论。就汉语而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谓结构,名词和动词不是对立关系,“名动包含”说不是名词中心论,而是名词为本论。

陶:沈先生,这样一来,乔姆斯基的理论是否受到质疑了呢?

沈:生成语法的基本造句规则是“S = VP + NP”,朱德熙在《语法答问》里已经指出这条规则对汉语不适用。更早的论证,赵元任指出汉语里主语和谓语的类型不受限制。比赵元任还早的要追溯到陆志韦(1963)的文章,陆先生从《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收集大量的实例说明,动词短语在汉语里做主语和宾语是常态。陆先生还有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对“我们先读论语孟子”这个句子,他说如果分析为“我们”是主语,“先读论语孟子”是谓语,那是先肯定了一个印欧语式的主谓结构,然而汉语的习惯分析法第一刀不是切在“我们”后面,而是切在“读”后面,即“我们先读,论语孟子”。“我们先读”是 VP,在汉语中可以做主语,“论语孟子”是 NP,在汉语中可以做谓语。而且这种断句法的好处是形成一个对称结构,前后都是四字。关于汉语的对称性,北京大学的林庚教授提出汉语新诗的格律要遵循“半逗律”,即逗号左右两边的字数要大致相等。五言一定是“2+3”结构,如“床前/明月光”,七言是“4+3”结构,九言是“5+4”结构。此外,汉语的双音字就是对称的,可比较汉语的“国家”“数量”和英语的 country、amount。

10 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

陶:接着您刚才就对言的论述,王寅教授将对称看作是汉语语法的第三种标记形式(前两种是语序和虚词),并且是最重要的语法手段,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对言或对称的?

沈:“对称”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重要!在物理学中,杨振宁、李政道高度赞扬对称性,20 世纪的

物理学就是以对称原则为指导原则。人是对称的,自然界是对称的,语言也是对称的。《文心雕龙》说,文之有骈俪,因于自然,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印欧语语法以主谓结构为主干,汉语语法以对话格式为主干。主谓结构“以续为主”,对话格式“以对为主、对而有续”。如果说主谓结构是印欧语语法的“仪式”,那么对话格式(最典型的是四字格)是汉语语法的“仪式”。王寅教授将对称性视为汉语语法标记的第三大手段,将汉语思维的“象思维”特征视为阴阳对称,正如我在书中讲的对话语法也包括“音义象对”(沈家煊,2019:270)。可见大家都在重新审视对称和对话对于语言和思维研究的重要性。

简言之,语言扎根于对话,对话形式象征对话双方的协作共鸣。现在国外有学者 Du Bois(2014:359-410)提倡“对话句法”(dialogic syntax)就是出于这个考虑。汉语的“对话”既指对话又指对称表达,我们理应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做得更好。对话语法和对话格式更接近语言的本性和本源。汉语不是语言演化的“活化石”,它是生机勃勃、长盛不衰的活语言。对话不存,生命不存(沈家煊,2019:封底)。

11 科学研判的标准

陶:您在本次访谈中多次强调“好的语法就是要简单”,那么为什么做语言研究要以简驭繁呢?

沈:语法研究的目的是追求单纯,以简驭繁。启功(1997:31,56,65)反复强调,讲语法要“以简驭繁”,不要“稍有一点差别,即当作另一类问题去处理”。以简驭繁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大道至简,科学的道理一定是单纯的、简单的。冯友兰(2013:320,325)从哲学的角度说,清晰的思想是每个哲学家不可或缺的训练,但是不是哲学研究的目的,哲学的性质决定了它一定是简单的,不然就是另一种坏科学,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达到单纯。对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来说,追求单纯不仅是科学信念,而且是他们认识物理世界的指导原则和从事研究的方法论准则。爱因斯坦说,理论应该“尽可能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语言的科学研究,以简驭繁是追求的目标,又是凌驾于不同学派之上的方法论原则(沈家煊,2019:191-192)。

陶:科学研判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沈:科学研判的标准要体现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是追求单纯。科学研判的标准除了严谨就是简单,简单和严谨同等重要。两个理论或体系,如果严谨(不能自相矛盾,不能循环论证等)都没有问题,就看哪个更简单。有人说还要加一条周到,覆盖的事实要周到。其实周到也是简单,同等条件下我的体系比你的周到,也就意味着我的比你简单。在追求单纯的时候,就方法论讲,分清主次和照顾全局很重要。这两点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认为能不能做到这两点是看一个科研人员素质高低的指标。当我们指出汉语的动词几乎都可以自由做主语宾语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不是汉语的特点,说英语也有大量动词可以做主宾语,例如“Work is work, and play is play”,这是典型的主次不分,英语中动词通过曲折变形变为名词做主宾语才是主要的,如 explode→explosion, criticize→criticism。上面那种用例是次要现象,而在汉语里是主要现象,要照顾大局。赵元任厉害之处就是因为他看得多,了解得多,有大局观。例如北方话说“你先去”,而广东话则说“你去先”。如何分析“你去先”呢?一般的分析是状语“先”后置,而赵先生认为不必如此,应该分析为“你去”是主语,“先”是谓语,因为汉语中主语加谓语结构就是话题(topic)加说明(comment)结构。汉语主语的类型不受限制,为什么“你去”不能做主语。这和古汉语“予生也晚”一样:“予生”做主语,“也”是话题标记,“晚”做谓语。这样分析的好处是,能够让汉语语序的整个大局不受破坏。赵认为,汉语的语序从古至今很简单,一直是“主语一律位于谓语前,修饰语一律位于被修饰语前,宾语一律位于动词

后”,这是汉语语序的大局,从古至今,而且覆盖不同的地域。如果把广东话“你去先”分析成状语后置,单独看是可取的,但是它破坏了大局。如果我们按照上文所讲的三个“一律”讲汉语的语序,语法规则会多么简明。破坏大局也就破坏了简明性。这就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赵元任的地方。所以在中国做语言研究的人一定要读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

陶:沈老师,最后衷心感谢您能够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围绕《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一书中的核心议题谈了十个方面,同时也道出了为什么在《名词和动词》之后的新著加上“超越”二字背后的科学研判精神。我们坚信您的这些思想将对中国的汉语语法研究、英汉对比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再次感谢,并祝愿您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 Bloomfield, L. 1916. Subject and Predicate[J].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13-22.
- Du Bois, J. W. 2014. Towards a dialogic syntax[J]. *Cognitive Linguistics*(3): 359-410.
- 冯友兰. 2013. 中国哲学简史[M]. 涂又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79. 汉语口语语法(节译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陆志韦. 1963. 从“谓语结构”的主语谈起[J]. *中国语文*(4):284-290.
- 启功. 1997. 汉语现象论丛[M]. 北京:中华书局.
- 沈家煊. 2013. 谓语的指称性[J]. *外文研究*(1):1-13.
- 沈家煊. 2015.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16. 名词和动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17. 沈家煊学术自传——我的语言学之路(节选)[EB/OL]. 今日语言学. <https://ling.cass.cn> 2017-3-8.
- 沈家煊. 2019. 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力. 1985.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徐长福. 2017. 主词与谓词的辩证——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探索[J]. *哲学研究*(5):11-18+127.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68. 中国话的文法[M]. 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From the Book *Beyond Subject and Predicate* to Talk: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hen Jiaxuan

TAO Tao

Abstract: Professor Shen Jiaxuan is sincerely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his interview. The ten kernel topic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new remarkable book in 2019, *Beyond Subject and Predicate——Dui-speech Grammar and Dui-speech Format*, are raised in the interview. What's more, one more question, based on the above ten, about the criteria on how to mak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judgement——simplicity and priority——is also involved in.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 Professor Shen's ideas better, the related books are recommended in his corresponding answers.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judgement; 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 nominalism; simplicity; priority; interview

责任编辑:朱晓云